

汉语研究方法论初探

徐通锵 著



商務印書館

汉语研究方法论初探

徐 通 锵 著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研究方法论初探/徐通锵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ISBN 7-100-03788-3

I. 汉... II. 徐... III. 汉语—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190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HÀNYŪ YANJIÚ FĀNGFĀ LUN CHUTĀN

汉语研究方法论初探

徐通锵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788-3/H·959

2004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4 1/2

印数 4 000 册

定价:24.00 元

序 言

这里收录的十七篇文章是我近二十年来所写论著的一部分,大体上可以反映我将西方的语言理论、方法和汉语研究相结合而进行语言理论建设的探索历程。十七篇文章分五组,首、尾两组虽然各只有一篇文章,但由于它们都代表一个独立的方面,因而在目录中独立成组。第一组的《说“结合”》一文主要是以汉语的方言和音韵研究为例讨论中西语言学结合的途径。这是我进行语言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后面几组文章的得失成败或许可以透视这种指导思想的成效与局限。“结合”,这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点学界没有争论,问题是如何“结合”?以什么为基础去实现“结合”?我自1956年毕业而成为语言理论研究的一个小兵以来,学界对语言理论研究最尖锐的批评就是“重洋轻中”“脱离实际”,只介绍国外语言学的某些说法,而不进行汉语的研究,而且介绍也没有介绍清楚。我国没有语言理论研究的传统,在一个学科的初创时期出现这样一些弊端虽然有其客观的原因,但这不能成为语言理论研究者“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病的借口。我既已成为语言理论研究的一个小兵,自然不甘心脑袋上顶着“重洋轻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帽子,因而总想在自己的业务活动中力避这些弊端,摘掉这两顶帽子。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不断地探索“理论联系实际”的途径的过程中,我思想上逐步明确“结合”应有自己的立足点,即应立足于汉语的研究去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立论精神,弄清楚人家

2 汉语研究方法论初探

是根据什么样的语言材料才提炼出我们所看到的语言理论来的,从中学习研究的思路、途径和方法,并根据汉语的研究去总结、提炼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以实现中西语言学的有效结合。《说“结合”》一文就是对这种摸索的一个小结,后面的几组文章则是这一“结合”的思想的具体实践。

第二组的四篇文章主要讨论语言变异和语言理论研究、语言史研究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接触以拉波夫为代表的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理论,觉得很有意思,但对他的一些论断的价值吃不透、拿不准,于是自己进行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根据汉语方言的变异去检验、评述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的利弊得失,吸收其有价值的立论精神,补正其不足,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一些语言理论的建设。这一探索过程的最重要的发现就是结构、变异和音变的相互制约关系,即结构的不平衡性产生变异,而变异的范围和方向则受音系结构格局的控制,并根据这种制约关系的研究提出语音的易变性和音系结构格局的稳固性的对立统一的理论和方法。这对语言史的研究我想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人们可以借此去研究语言的演变,用现实的音变机理去解释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音变规律。第三组的四篇文章就是用这一原理研究汉语的音节结构,从音系的角度探索每一位置上音位的结构规律、运转规律和演变规律,对一些有争议的音变规律作出了新的、有现实语言材料可加以验证的解释。这是我在“结合”道路上迈出的有点价值的一步。迈出这一步很艰苦,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探索,碰了不少钉子,才从《马氏文通》以来中西语言学的结合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中逐渐悟出“结合”的真谛。吕叔湘先生说:“‘结合’二字谈何容易”(为龚千炎《中国语言学史稿》写的序言),有了自己的一些真情实感,对这八个字的千钧分

量才有了一点认识。

第四组的七篇文章集中研究汉语语义句法,第五组的一篇研究语汇,这八篇文章都是以“字”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而展开的语言理论研究,现在一般称之为“字本位理论”。这是对“结合”途径的一次新的探索。在语言变异的研究中,我逐步感觉到“结合”必须有一个可靠的立足点,不然就难以把握研究的方向。《马氏文通》以来,我们中西语言学结合的立足点是“西”,基本上是以印欧语的理论、方法为基础,把汉语“结合”到这种理论中去研究,结果是抛弃了自己的研究传统,用印欧语的理论模式来改造汉语的研究。固然,科学无国界,我们需要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但不管自己的研究传统、紧跟西方的语言理论,“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吕叔湘,同上),终究不是中国语言学应该遵循的发展道路。毋视或忽视自己有悠久传统的语言研究,我想最终是不会有出路的。这种反常发展的原因在哪儿?是“结合”的立足点弄错了,我们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不应以印欧语的理论、方法为立足点,而应立足于汉语的研究,吸收印欧语理论的立论精神,即它如何从材料的梳理中提炼出相应理论的思维方法和论证方法,对汉语的特点作出理论的解释,进行我们自己的语言理论建设,摆脱“跟着转”的研究思路。汉语的特点集中表现在哪儿?一言以蔽之,就是“字”。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汉语特点的凝聚点,正像词和句是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集中凝聚印欧语的特点一样。要立足汉语的研究,就应该紧紧抓住字,使其成为“结合”的立足点,以实现中西语言学的有效结合和现代语言学与汉语传统研究的有效结合。四、五两组的八篇文章都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写成的。这是“结合”的新思路,“离经叛道”,直接与

现在流行的理论相冲突,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固守现行研究阵地的人们的反对。学术的生命力在于竞争,在于争鸣,有人反对不是坏事,但遗憾的是,一些反对的文章缺乏研究,提出的理由有点想当然,或者扣一顶“违背常识”之类的帽子,真正能提出实质性问题的文章不多。这难以促进不同理论的竞争或争鸣。固然,“字本位理论”的研究现在还仅仅是开始,研究的成果也还比较粗糙,有待于改进的地方颇多,但已经提出了一些带方向性的重要问题,这是不容置疑的。就我自己的研究进程来说,应该说已经实现了“结合”立足点转移的初衷。这是一次带方向性的转移,现在已得到不少同人的理解与支持,相关的研究成果已陆续问世或即将问世,相信今后会得到更多人的理解与支持。

从事语言理论研究已近半个世纪,我探索的始终是中西语言学的结合的途径,从最初以汉语的例子注释国外语言学家的论断的“拼合”,经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去鉴别、吸收、补正现在流行的理论,到“结合”立足点的转移,总算在“结合”的道路上摸索出一点成效。尽管“结合”的道路没有尽头,需要不断地随着语言研究的发展而加以改进和完善,但我深信自己探索和追求的“结合”的方向是不会有问题的,随着研究的深化,“结合”立足点应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和现代语言学与汉语传统研究的结合,这一方向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十七篇文章,因写作时间的先后曾使用过不同的符号,这次结集出版作了统一;文字上只对个别字句作了一点改动,只在必要的时候加几句话或加一个注;引文中一些原注“待刊”“未刊”的文章,已根据后来发表的时间予以注明。第二组文章是在1991年以前写成的,行文中仍旧使用“词”“语素”的概念,为保留原文的面貌,

这次没有改动。感谢曾为这些论文的写作提供过很多帮助的王福堂先生、王洪君女士和过早离开人世的学长叶蜚声先生,感谢商务印书馆为这本集子提供一个出版的机会。论著的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徐 通 锵

2001 年 11 月于北大寓所

目 录

说“结合”.....	1
宁波方言的“鸭”[ɛ]类词和“儿化”的残迹	25
变异中的时间和语言研究	44
音系中的变异和内部拟测法	71
结构的不平衡性和语言演变的原因	99
音系的结构格局和内部拟测法.....	129
音系的非线性结构原理和语音史的研究.....	164
“阴阳对转”新论.....	185
声母语音特征的变化和声调的起源.....	213
语义句法刍议.....	242
“字”和汉语的语义句法.....	276
说“字”.....	302
有定性范畴和语言的语法研究.....	327
自动和使动.....	355
“字”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机制.....	378
汉语的特点和语言共性的研究.....	400
编码机制的调整和汉语语汇系统的发展.....	426

说“结合”^{*}

——就汉语音韵的研究浅议

中西语言学结合的途径

【提要】立足汉语的研究,实现中西语言学的有效结合,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联系高本汉以来的汉语音韵和方言研究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对中西语言学的结合途径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探索,认为汉语特点的研究是实现有效“结合”的基础,而汉语事实与印欧语理论的矛盾则是启示“结合”新思路的突破口。

世界的语文研究有三大传统,即希腊—罗马传统、印度传统和中国的小学传统。18、19 世纪实现了希腊—罗马和印度两大传统的结合,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印欧语研究传统。这一结合对语言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重要的标志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使语言学从此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19 世纪末,以《马氏文通》的出版为标志,汉语的研究传统也开始走上了与印欧语研究传统相结合的道路。由于汉语的结构与印欧语有原则的差异,这一结合道路的探索艰难而曲折,喜悦与苦闷并存。就总体发展趋势来

* 据 1996 年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的讲演稿修改,发表于《语言学问题集刊》第一辑,戴昭铭、陆镜光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看,汉语音韵和方言的研究结合的成效比较显著,而语法、语言理论等的研究问题比较多,可以说至今也还没有找到一条有效的结合途径。为了推进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对百年来结合道路上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一些探索和梳理,不是没有意义的。语法与语言理论方面的问题我们已另文讨论(徐通锵,2000),这里仅想联系汉语音韵与方言的研究讨论中西语言学的结合途径,就我之所见,对成功的经验与失误的教训进行一些梳理。如果言之成理,它的结合的基本精神对语法和语言理论研究也许也有一些借鉴作用。

一 历史比较法和传统的 汉语音韵研究的结合

汉语史的研究有悠久的传统,大体上以字为基础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从书面文献材料的分析和排比中寻找语言演变的线索。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言之有据,结论较为可靠,缺点是语音史的研究只能区分声、韵、调之类的音类,无法对语言的演变进行具体的语音学的描写,而且还无法研究史前时期的语言结构。概括地说,汉语史只偏重于“死”材料的研究,而不考察(至少是很少考察)方言、亲属语言等对语音史研究有重要作用的“活”材料。西方的历史语言学与此相反,它注重方言、亲属语言等“活”材料的分析和研究,从语言的空间差异中寻找语言在时间上的发展序列,创造了历史比较法和历史比较语言学。这两种传统各有特点,长短互补,如能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把它们结合起来,自然会对历史语言学的发展发生积极的影响。但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吕叔湘 1986 年在为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写的序言中说的这八个字,字字千

钩,因为“结合”不是西方的语言理论加汉语的例子,而是要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参照西方语言理论的立论精神,从中吸取于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借以有效地揭示汉语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如果无法用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解释,那就得根据汉语结构的特点,提炼新的理论假设,以补正和丰富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汉语音韵和方言的研究大体上是顺着这一结合的道路前进的。

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就其大的思路而言,主要就是青年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无例外”和方言地理学的“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其他如内部拟测法、词汇扩散理论、变异理论等都可以归入这一种理论范畴或那一种理论范畴。为什么?音变理论是对语音演变的解释。经常谈到的音变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叫连续式音变,另一种叫做离散式音变,这是自然界中连续与离散两种现象在语言演变中的反映。连续性音变以共时语音条件为基础,即凡是在相同的语音条件下,一个音位在同一地区、同一时间将会依照“语音规律无例外”的方式进行演变。青年语法学派的音变理论和结构语言学的内部拟测法所研究的大体上就是这一类的音变方式。方言地理学所研究的音变是离散式音变,强调“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否定方言土语的存在和音变的规律性。词汇扩散理论研究的也是这一种音变方式;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理论虽然兼顾两种音变方式的研究,但就总体看来,仍以离散式音变的研究为主。这两种音变理论原来在汉语研究中都没有基础,是“鸦片战争”以后因西学东渐而引入汉语研究的,由此开始了西方历史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的结合,使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

连续式音变是语音演变的一种最基本的方式,因而以“语音规

4 汉语研究方法论初探

律无例外”为标志的青年语法学派的音变理论对后世的语言研究有深刻的影响。历史比较法是研究这种音变方式的一种最基本的方法。20世纪初叶,这种理论开始与汉语音韵研究相结合,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代表作是《中国音韵学研究》。汉语传统的音韵研究到清末已走入尽头,因为用语文学的方法已经很难使汉语史的研究产生新的面貌,因而中国语言学家发出了要求改革语言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呼声:过去的成就“只能使我们约略地知道古今变迁的大齐,不能使我们明白声韵发展的程序。这实由于他们所根据的材料,读音不能古于《广韵》,参证不外乎谐声、音训、韵文、异文等类的缘故。讲到这里,我们可感着比较语言学的需要了”(潘尊行,1923)。正当汉语音韵的研究处于“旧路不通,新路不明”的时候,高本汉运用历史比较法来研究汉语的音韵发展,开创了一条全新的途径。尽管此前也有人用历史比较法来研究汉语,但不是很系统,影响也比较小,暂时可以不予考虑。“结合”的特点是先根据《广韵》的反切整理出“古音字类表”,作为切韵音系的音类框架,而后利用汉语方言的材料对切韵音系进行语音学的描写,也就是根据汉语的特点把历史语言学的一条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从语言的空间差异中探索语言在时间上的发展序列”中国化,把方言的活材料和切韵之类的“历史上的旧材料”结合起来,描写汉语音韵演变的历史规律。而后,再以切韵音系的研究为基础上推先秦古音,利用清儒上古音的研究成果和汉字的谐声系列,运用内部拟测法等对上古音系进行语音学的描写。这样,高本汉就为汉语史整理出一条从先秦经切韵音系而到现代方言的发展线索,开创了语言史研究的一个新的格局。从方法论的原则来说,这一“结合”的特点就是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运用历史比较法、内部

拟测法的基本原则,把空间和时间结合起来,把“回顾”与“前瞻”两种研究途径结合起来,以探索汉语的历史演变。这是我们以往不曾有过的研究原则,把它应用于汉语音韵的研究成效非常显著,既有效地吸收和使用诞生于西方的历史比较法,也没有忽视汉语本身的结构特点;说得更正确一点,这种结合是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去吸收西方的历史比较法来解决汉语史的问题,因而理论和方法都比较稳妥,研究的成果自然也比较成熟,为此后的汉语音韵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的原因是汉语本身的研究有扎实的基础,已为历史比较法的运用准备好了必要的条件。用高本汉(1940)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在汉语音韵研究中碰到过两次好运气:研究切韵音系的时候有切韵系统的各种韵书、韵图和日、朝、越等各种借音材料;研究上古音的时候有诗韵和汉字的谐声,使他有可能拟测周初王都的发音的主要特征。在这里强调这一点不是多余的,因为某些领域的“结合”(例如语法),由于传统的汉语研究缺乏这方面的基础,自然就难以摆脱印欧语理论的束缚,取得预期的成果。高本汉以来的汉语音韵研究,尽管具体问题有争论,但其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始终没有动摇过。继高本汉之后,王力、董同龢、李方桂、罗常培、陆志韦、张琨、李荣等的汉语音韵的研究都以高本汉的研究为基础而向深化的方向发展,并纠正高本汉的疏漏。两相比较,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方法用来研究汉语语音史所以能取得卓越的成就,最主要的经验就是:立足于汉语结构特点的研究去吸取西方语言学中于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而不是用这种理论、方法来剪辑汉语的事实;遵守这一原则,汉语史的研究就会取得明显

的进展,反之,离开这一原则,就难以取得成效。高本汉的汉语史研究最成功的是切韵音系的研究,上古音系次之,因为这两方面都有扎实的汉语音韵的研究作基础。他的远古汉语的研究,即汉语词族(word families)的研究,情况就不同了,由于缺乏汉语研究的基础,一切模仿印欧语的 ablaut(元音变换),离开了汉语的结构特点,因而他的研究成果也就难以经受实践的检验。相比较而言,杨树达和沈兼士的研究就要可靠得多。这方面的批评和论述可参看徐通锵 1997 和何九盈 1998。

二 新思潮的冲击和“结合”原则的改进

20 世纪 60、70 年代,语言学思潮的主流是乔姆斯基的生成理论,主张普遍唯理语法。和汉语史研究有关的理论和方法,当时活跃在美国的一些年轻学者,如罗杰瑞(Jerry Norman)、桥本万太郎等提出了一种假设,人们称之为“普林斯顿假设”(Princeton hypothesis),认为汉语的方言关系比高本汉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很多现象无法从书面材料中得到解释,因而主张汉语史的研究应该严格采用 19 世纪在印欧语研究中行之有效的历史比较法,从复杂的汉语方言的差异出发,不管历史上的文字、文献材料,先为每一个基础方言拟测出它们的原始方言(proto-dialect),如原始北方话、原始闽语、原始粤语、原始吴语等,而后再在此基础上拟测出原始汉语。这两种理论的基本精神都是以语言的普遍特征(universals)为基础,主张理论的绝对普遍适用性,忽视(至少是不强调)不同语言的不同的特点。这对以汉语特点的研究为基础实现中西语言学结合的原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冲击。科学没有国界,反映

客观规律的理论自然适用于不同语言的研究,有它普遍适用性的一面,但这绝不是说可以忽视不同语言的特点和不同语言的研究传统。理论是根据部分材料的研究而提炼出来的一种假设,需要不断地在研究实践中根据新发现的材料进行补充、调整和修正。不管是乔姆斯基的生成理论,还是 19 世纪的历史比较法,都得根据不同语言的研究加以补充和修正。我们所以肯定高本汉以来汉语音韵史研究的一些基本原则,就是由于它不是生搬硬套地使用 19 世纪的历史比较法,而是以传统的汉语音韵研究为基础,紧紧地把握汉语的特点,对历史比较法的程序和原则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和修正,从而对汉语音韵的发展规律进行了有效的语音学描写。生成理论的基本精神和“普林斯顿假设”基本上否定了这种运用理论的原则。这样,是坚持高本汉以来汉语史研究的一些富有成效的原则,还是根据理论的绝对普遍适用性原则,不管汉语研究的传统,重起炉灶?这是摆在中国语言学家面前的一个尖锐问题。我们当时正处于十年动乱时期,根本没有条件去思考这种挑战;生活在国外的华裔语言学家面对这种冲击开展了一系列有成效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研究思路,其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张琨和王士元。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琨原是研究汉藏系语言的专家,60 年代开始转向汉语史的研究。面对在语言学中占支配地位的生成理论和汉语学研究中的“普林斯顿假设”,他仍旧坚持汉语方言与书面文献材料相结合的原则来研究汉语的历史发展,但比高本汉的研究前进了一步,充分考虑到语言发展的复杂性。这主要表现在:方言的差异不仅是现实的,而且也是历史的,应该充分考虑历史文献中所隐含的方言差

异。《切韵》不是某一方言的共时音系的代表,而是隐含有很多南方方言特点的韵书,代表一种“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综合音系,体现中国音韵的历史演变,可以据此上推到早于《诗经》的上古音系;《切韵》也不能看成为现代各方言的母语,而应该根据每个方言的特点简化切韵音系,将“综合”音系中不反映该方言特点的音类简化掉,合并到相关的音类中去,为某一方言的原始方言建立音系的音类框架,而后再比较方言内部的差异,对这种简化的切韵音系进行语音学的描写,进而勾画出语音演变的线索和规律。这一理论主要见之于他的代表作《上古汉语的韵母系统与切韵》(*The Proto-Chinese Final System and the Ch'ieh-yün*),其所依据的方法论原则仍是立足于汉语,以《切韵》之类的书面材料和汉语方言的研究为基础,充分考虑历史方言在语言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据此灵活运用历史比较法的原则。它既坚持了高本汉以来中西语言学结合的基本原则,并对其中的不足之处作了明显的改进,又吸取了“普林斯顿假设”的一些合理内涵,把简化的切韵音系作为原始方言的音类框架,尽可能使汉语史的研究能更好地反映汉语演变的实际。张琨认为,完全否定《切韵》之类的书面材料在汉语史研究中的地位,只凭方言差异的比较拟测原始方言,就有可能使语言史的研究“跑野马”,失去控制,结果是拟测出来的原始语可能与汉语的实际状况风马牛不相及。汉语是有悠久历史的语言,面对否定文献资料在汉语史研究中的价值的新思潮的冲击,张琨既强调现实方言与书面文献资料的结合,又重视隐含在书面文献中的方言差异在语言史研究中的价值,这样的原则是无可非议的。它是对高本汉以来的“结合”原则的改进。

王士元从另一个侧面对“结合”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不是专